



铁皮柜间行走30年，日理档案800份

济南车管所档案员：海量档案见证了济南的变化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刘云鹤

仓库档案摆得密密麻麻 人只能侧身通行

6月22日，记者到济南车管所采访时，李书惠正推着一辆如超市购物车一样的推车，载着一车的档案袋穿梭在各个档案柜之间。每个档案柜有2米高，身高只有1.55米的她每次整理4层以上的档案都需要像现在这样爬柜子或者踩板凳。这只是档案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却也是最耗体力的一部分。

济南小型车辆档案库一共有300多万份档案，其中有270万份分布在济南车管所5个仓库中（剩余的30多万份在莱芜）。每个仓库的档案就有几十万份，摆得密密麻麻，柜与柜之间空间狭小，人在其中只能侧着身子行走。一个档案库从东头到西头是100米，在其中走上半天就能达到1万多步。常人一天下来早就腰酸背疼了，李书惠多年下来已经习惯了，不但练了脚力臂力，就连嗓门都练响亮了。“档案柜都是铁质的，屏蔽信号，有事只能靠‘咋呼’。”李书惠打趣道。

李书惠今年51岁，已经在交警系统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多年。2000年，她进入车管所后开始从事小型车辆档案工作，从最初的新车注册、车牌号发放，到档案的转入、变更与转出，一条线走下来，又到了现在的仓库。仓库的工作主要是过户归档、外转归档、出库、转籍、归档等。近期，国家档案局向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年的人员颁发荣誉证书，李书惠也获此殊荣。

从这些档案背后，李书惠也见证了济南的发展。2000年的时候，济南的小型车辆档案只有10万份；到了2010年，达到70多万份；2014年，仅4年时间，就到了140万份；再到2021年，就到了300多万份。“一是大家的生活变好了，平均每个家庭一辆甚至两辆车；再就是济南的营商环境变好了，很多外地车到济南来挂牌。”她说。

现在，李书惠平均每天要整理800多份档案，只要一上班，手里的活就停不下来。她所在的小型车辆档案组一共9个人，每天归档、外转、电子迁出、手续入库等各类档案近万份。

弄错一个数，档案就会“走失” 再去纠正犹如大海捞针

整理档案的工作看似机械，却是相当考验人的。21到23个号段，12位档案编号，上百万的号，搞错一个数字，档案就会走错一间屋子甚至是一层楼，再去纠正无疑是大海捞针。

工作几十年，因为严谨仔细，李书惠从来没有出过错。也是因为这份严谨，她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有的问题档案她一眼就能感觉出不对劲。原来的时候看车辆附加税，她可以在没有任何仪器的情况下发现问题。几年前，李书惠经手的档案里转进来一辆红旗车，这辆车最早是在济南注册，辗转几年后又回到济南。当时已经快下班了，李书惠也没有草率，最后联系技术科的人倒查，果然查出有问题。那也是当年她查出的第一辆盗抢车。

对着一堆堆资料，一串串数字，李书惠即使看到两眼冒金星也一点都不敢马虎。在李书惠的办公桌上，台账本已摞了厚厚一层，每个本子有5厘米厚，正反两面用。翻开一本，上面的业务记录密密麻麻。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每天干的工作能记个大概，年纪大了，李书惠担心出问题，开始习惯记台账。

在李书惠看来，认真仔细不只是对工作负责，更是对老百姓的负责。

一份档案就是车辆的一生 这份工作在她看来很有趣

在别人看来枯燥、重复的工作在李书惠眼里却是生动有趣的，一辆车从新车注册、到变更、再到销毁，就像看着一个婴儿出生，成长到最后衰老。每次的变化，可能都包含着一段故事，这一个一个的故事，构成了这辆车的一生。

在档案柜上，每一辆车的档案都用一个个厚度不一的文件袋装订着，厚的档案袋能达到两三斤的重量。用李书惠的话说，这就是这辆车的一生。她随机打开一袋大约有两寸厚度的档案袋，里面是一辆小型汽车的所有材料，一共有23份。这辆车的一生是这样的：2007年在辽宁注册，它的发票、附加费、保险，身份证明收集起来，这就形成了一本档案，其间这辆车从辽宁转到临沂，中间还经过法院拍卖，共经历了6位车主，最后在济南报废。

这种情况很多，有些车辗转几个城市，从李书惠的手里几进几出。在李书惠

眼里，这些车如同一个个生命，对每一份档案负责，也是对它们这一生负责。

不过这几年，李书惠也明显感觉到，纸质的档案袋越来越薄了。过去的档案，是一张张大小不一的纸张，后来规范一些用A4纸装订，再后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化影像资料走进交管部门，实物档案就越来越少了。“要是还如同以前一样全是纸质的，恐怕这栋楼也放不下了。”李书惠笑着说。

一辆车的转入转出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为了让年轻人更好地理解，李书惠还专门整理了一个退档宝典，有车辆附加费、轮胎规格、抵押、公章、压线问题等一共整理了49个文档，打开一个个文档，多的时候里面的项目能达到129个。

交管业务流程优化背后 档案员的任务更重了

在李书惠的台账本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任何工作都值得你全身心去爱”，她在实际行动中也是这样做的。三十多年来，李书惠获评过优秀共产党员，立过两个三等功，九次考核优秀。旁人说起这些，李书惠摆摆手，“都是些很平常的工作。”

在每一个小型车辆电子迁出的档案袋上，都留有李书惠的个人电话。前几年的时候，无论白天晚上，她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这几年，交管业务流程不断优化，电话也少了很多。李书惠的丈夫也是交警，也经常接到老百姓的电话，她打趣，两口子谁也别嫌弃谁，因为俩人的手机一起响。

在李书惠背后，是许许多多档案工作者，正是他们的认真和严谨，才让车辆的每一次变更都更加顺利。“因为我们做得严谨，差错率低，服务好，很多车贩子都喜欢收购济南的二手车。”济南车管所档案科科长柳滨说。

随着公安交管简政便民措施的实行，老百姓办业务越来越便利。比如一个济南人，他想带着车去青岛工作，这要在原来，办手续怎么都要折腾两三天。而现在，车主只需要在手机上用济南车管App就可操作将车转到青岛，最多只需要一天的时间。为老百姓提供便利的背后，李书惠他们的任务更重了，原来三天的活，现在要在一天内做完。

即使如此，李书惠他们依然乐在其中。他们中流行这样一句话，“让在岗位在状态成为常态。”说完这句话，她推着推车很快消失在密密麻麻的档案海里。



身高只有1.55米的李书惠在一间档案仓库中吃力地整理档案柜最上层的材料。



邓中夏

“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邓中夏，1894年10月出生，湖南省宜章县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又是我党的一位重要理论家和学者。

1917年，23岁的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转入哲学系学习。1919年，邓中夏参加五四运动，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的行动。

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工作时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对狱中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说：“请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

1933年9月21日，南京雨花台刑场，邓中夏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9岁。



苏兆征

为工人运动鞠躬尽瘁

苏兆征，1885年出生在珠海淇澳岛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时到香港谋生。开启了在外轮做工的生涯。

1921年3月，苏兆征和林伟民等人倡导，在香港成立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1922年1月12日，在香港海员举行的大罢工中，苏兆征被选为罢工委办事处总务部主任和谈判代表之一。

1925年3月，苏兆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苏兆征赴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均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并当选为农村工会国际副委员长。

长期艰苦的斗争和紧张的工作，使苏兆征积劳成疾。1929年2月25日，苏兆征不幸病逝。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对前去探望他的周恩来等人说：“大家同心合力，一致合作，达到革命的最后成功！”



蔡和森

用生命践行立下的誓言

蔡和森，1895年出生于上海，湖南双峰人。1913年，蔡和森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后与毛泽东成为同学。

1919年12月，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蔡和森“猛看猛译”上百种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他与陈独秀和毛泽东通信探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的主张，成为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第一人。

1931年，蔡和森赴香港指导广东革命工作，不幸被捕。在狱中他顽强斗争，直至英勇就义。生命定格在36岁。“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眼，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践行了当年立下的豪迈誓言，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毛泽东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瞿秋白

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1899年1月，瞿秋白出生在常州。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1年5月，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联共（布）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8月，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重要贡献。

1931年1月，瞿秋白遭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迫害，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他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和鲁迅并肩战斗，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他坦然走向刑场，饮弹殉国，从容就义，时年36岁。